

演化经济学：21 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

贾根良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天津 300071)

摘要:直到今天,许多人仍意想不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的终结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个重要后果。21 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又将重现 19 世纪下半叶经济学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将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由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锁定了美国许多“顶级”大学的经济学院,演化经济学在美欧的发展仍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这就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后来居上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中国学者应该发挥血气方刚之气概与独立自主之精神,推动演化经济学在中国获得原创性的大发展。

关键词:21 世纪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多元主义;演化经济学;中国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 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0262(2005)02 - 0001 - 05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决不会简单地重复。19 世纪下半叶,以约翰·穆勒 184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标志,古典经济学开始趋于衰落,到 19 世纪末,欧美经济学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的局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世纪之初的国内外经济学界都在经历着类似的变化。冷战时期两种极化的意识形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冷战结束后,这两大经济学体系都相继陷入了危机。按照我的观察,“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回光返照,而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1]则标志其统治地位的终结。

然而,虽然人们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危机存在着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对于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危机,许多人肯定会提出强烈的异议。确实,作为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统治了美欧国家绝大部分大学的经济学院,而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统治地位也几乎扩展到了所有的其他国家。在我国大学的经济教育中,新古典经济学教学体系被大规模引进,而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研究传统的介绍和研究却被严重地忽视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西方主流化的趋势。在这种狭隘的视野下,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被等同于“现代经济

学”^[2],它之所以在经济学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基础作用和基本地位”^[3],正如茅于軾先生所指出的,“它的基础非常坚实……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这就是现在的发展方向。”但是,果真是如此吗?

茅于軾先生可能不会想到,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师生们是不会同意他的看法的。2000 年 6 月,法国经济学学生以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秉承创造的乐观主义精神,终于发动了一场颠覆新古典主流在西方经济学界霸权地位的国际运动。法国经济学学生的请愿书反对经济学中没有控制的使用数学;反对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占压倒性的统治地位;反对它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法国学生呼吁结束这种状态,他们提出,经济学要面向经验的和具体的经济现实,采用科学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态度,坚持经济学方法的多元论。为了从离群索居的经济学思考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状态中拯救经济学,他们呼吁经济学教授们发动改革。四年来,这种由学生发起并有许多经济学家参与其中的经济学改革运动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反响,并导致了经济思想史上对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和经济学教育最活跃的讨

* 收稿日期:2004 - 10 - 10

* 该文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译丛》的总序。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男,河北蠡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天津商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演化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

论。^[4]在我看来,这种大讨论正在为一种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开辟道路。

如果说由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爆发,新古典经济学陷入了“科学基础的危机”的话,那么,“华盛顿共识”的终结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实践上的破产,而“北京共识”则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是由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所提出,并成为“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福山“历史终结论”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表现:英美市场经济模式是正常的、最优的和不可能超越的事物状态,它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的必然选择。“华盛顿共识”集中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的思维模式。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资深咨询顾问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替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精髓是试验和创新,说明了市场经济本身是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走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充分肯定。“休克疗法”曾是“华盛顿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与之迥然相异,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演化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与之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为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原创性之发展奠定了经验性的基础。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笔者认为,21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又将重现19世纪下半叶经济学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陷入危机,经济学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目前的经济学变革与19世纪下半叶有很多类似性,但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别。例如,19世纪下半叶的许多流派大都是在古典经济学的解体过程中出现的,而目前所谓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早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地位的终结之前就已诞生。除了我曾列入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调节学派外,西方异端经济学还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历史经济学、后现代经济学、后殖民经济学和人类经济学,等等。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这些流派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但经济学多元主义为这些学派的合法地位提供了根据: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各流派都是理解经济现象可能的手段,任一种流派都不应声称对经济问题拥有最终的和全面的答案。

但是,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汉弥尔顿指出的,人类在某种领域中探索的进展常常与其他领域中的进展是互补的,而且,如果某种领域中的突破是划时代的,那么它就会对许多其他领域中人类的思维习惯产生深远的影响^[4]。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说明,新古典范式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戈金在其与斯唐热合著的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经典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6]作为科学的一种新范式,演化和多样性的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中诞生的。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革命更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达尔文的不确定性思想,20世纪下半叶的复杂科学本质上也与达尔文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和决定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达尔文主义则是以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的。与目前仍被牛顿主义所支配的主流经济学相反,新的世界观则构成了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基础。

回顾历史,德国演化经济学家魏特指出^[7],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

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 100 年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实际上,早在 1898 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8]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该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9]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只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末,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又重新开始的^[10]。

但是,这种重新开始的“科学革命”仍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首先,由于新古典主流锁定了美国一些“顶级”大学的经济学院,这将导致演化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非常迟缓。目前的主流仍满足于对新古典研究纲领进行修修补补,教条主义盛行,哈佛大学经济学学生请愿活动的失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似乎无法触动美国经济学的教育体制。然而,如果不冲破旧思想的樊篱,新思想就很难扎根。其次,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统一的研究纲领仍未完成。1996 年,萨维奥蒂写道,现代演化经济学完全是生物学思想,加上非平衡热力学和系统理论、企业与组织理论,以及信息处理和有限理性理论的一个综合体。虽然萨维奥蒂的概括并不全面,而且现在也有了许多重大的进展,但演化经济学不发达的状况仍未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许多人肯定会说,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只是纠集了一群乌合之众,演化经济学虽然新颖,但前途未卜,最好别追随这种所谓的新范式。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这种认为,那么,我敢说,我们就有可能错过中国经济学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机会。

经济思想史的观察告诉我,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萌芽可以在主流经济学锁定非常严重的国度被发现,但它的成长和壮大很可能就要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如果某个国家的经济将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学也会成为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最近几年,我一直存在着一种直觉上的判断,这就是演化经济学将有可能在中国获得更快的发展,并有可能在 21 世纪下半叶领导经济学的国

际潮流。我的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与林毅夫和汪丁丁两位先生的观察相同,但观点不同。林毅夫认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大多先后产生于当时的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在 21 世纪 30 年代很有可能超过美国,特别是中国快速和剧烈的制度变迁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问题很有可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11]。汪丁丁则把中国经济学家的意识归结为“大范围制度变迁”,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具备的^[12]。我赞同他们的这些观察,但不同意他们对新古典主流的绥靖态度,因为如果要处理“大范围制度变迁”,我们不仅必须打破新古典假定不变的所有前提条件,而且也需要一种更新颖的方法,而这正是演化经济学一直在尝试的工作。总而言之,追随西方主流在中国不可能产生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之上,如果没有重大理论创造,中国的经济学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生物学中的物种形成“分布区不重叠”原理。进化生物学认为,同一物种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突变的突现和选择,但这种竞争禁止了需要一套互补性(超静态)突变的新物种的形成。换言之,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每一物种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它与其他物种的共演的时候,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演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间断”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外围地区,也就是说,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地区,这就是物种形成“分布区不重叠”的条件。这不仅解释了历史学派为什么在古典经济学家群星灿烂的英国遭到压制,也解释了新古典主流不可能在历史学派曾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繁荣起来,更说明了演化经济学的大发展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因此,中国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美国,这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如果只从边际革命算起,新古典经济学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而演化经济学如从 20 世纪 80 年代算起,才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并且其发展受到了主流经济学思维很大的影响。因此,演化经济学不仅非常弱小,而且也有着较大的缺陷。但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我们不仅要敢于接过这种异端的工作,而且还要勇于批评它。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妄自菲薄,因为中国经济学的草创需要血气方刚之气概与独立自主之精

神。否则,领导未来的经济学新潮流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目前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编写一本相对成熟的基础原理教科书。经济学本科教育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西方演化经济学之所以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演化经济学没有进入本科课程,而且缺乏一套能被人们系统学习的知识体系。其次,展示解决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例如,如何理解“北京共识”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如何系统地总结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如何回答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首要挑战。第三,稳步拓展新范式,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引入演化经济学的新思维。例如,目前国内外产业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前沿是新制度学派,而演化经济学在这个领域的大量成果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导致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发生重大变化。第四,探索相对完善的研究纲领。研究纲领的核心是世界观,但要对实际的经济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就必须把世界观转变成能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正面启示法。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创造者不仅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也要在科学哲学上有所创造。无疑,这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通过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的。笔者曾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种研究传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正如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创建者的工作经由马歇尔之手加以整理、精练和综合,使其以较完备的形态出现一样,这项工作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目前的演化经济学视野仍是有较大局限性的,例如,它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新奇惊异对研究纲领的重大意义,但对人文关怀则重视不足。因此,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在西方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以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更广泛的异端传统进行较全面的综合。笔者认为,自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经济学研究就分裂成了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这些流派大

都采用的是历史的和演化的方法。因此,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传统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演化经济学译丛。自2000年以来,笔者就希望把演化经济学的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曾多次联系出版社,但直到现在,承蒙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这个夙愿才得以实现。这个译丛所收录的著作主要是西方演化经济学含义上的。但是,为了使读者对演化经济学兴起更广泛的智力背景有所了解,我们在本译丛中还选录了有关经济学危机和新方向的两种著作。而且,创新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最成熟的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在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研究上较充分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本译丛收录了这方面的最新著作。此外,在著作的选择上,考虑到我国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需要,本译丛还特别注意到了演化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所有的著作都是笔者从2001年以来新出版的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以期较全面地反映西方演化经济学及其相关方面的最新发展。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当我们在世纪之初展望演化经济学的未来之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科学的母体,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其新创造的产物。经济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吾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他们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注 释: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主要看作是意识形态或政策方面的则是错误的,它更多的是在科学基础上。参见爱德华·富布鲁克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该书被收录到贾根良主编的《演化经济学译丛》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笔者对李冠一的答复请见:《中国经济学教育与发展要走与西方不同的道路——答李冠一先生》,经济学家网站(www.jjxj.com.cn)。

茅于軾:《主流非主流并没有太大分歧——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軾》,社会科学报,2004年5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2004年第7期。笔者认为,茅于軾把以左大培等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也看作是以新古典主流为理论基础的,这种看法明显地是不成立的。

参看贾根良:《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演化经济学假说并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5

期。

参看贾根良:《批判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视野》,载张仁德等著:《新比较经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5 - 36 页。

有关经济学多元主义,可以参看霍奇逊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2005 年上半年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 [1] 贾根良.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 [J]. 南开经济研究, 2003(2): 3 - 11.
- [2] 钱颖一. 理解现代经济学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2): 3 - 13.
- [3] 李冠一. 主流经济学在国内并不热——与贾根良先生商榷 [N]. 经济学消息报, 2003 - 04 - 18(4).
- [4] 爱德华·富布鲁克. 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 600 天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5] Hamilton D. Newtonianism and Darwinism in Economic Theory [A]. Hamilton 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18.
- [6] 普里戈金, 斯唐热. 从混沌到有序: 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64.
- [7] Witt U. The Evolving Economy: Essays on the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Economics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Chapter 1.
- [8] 凡伯伦. “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演化)科学?”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4(2): 127 - 137.
- [9]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8.
- [10] 八木纪一郎. 进化经济学的现在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4(2): 160.
- [11] 林毅夫. “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总序 [A]. 安德鲁·肖特. 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 [C].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汪丁丁. 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4(3): 45 - 63.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e Theme of the 21st Century Economics

JIA Gen-liang

(Economics Depart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ill now, plenty of people could not realize that it is a significant result of the ending of “Cold War” that neoclassic economics lost its dominating posi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economics will experience another dramatically changing epoch just a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of economics happened in the late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rising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will definitely b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is coming era. But most of top economics colleg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been “locked-in” by the main-stream, neoclassic economics, and the expression and development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re still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both in American and in European countries, which offer a great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economists to catch up and surpass from behind.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achieve giant originated development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with their courage and independent thoughts.

Key words: the 21st century economics; neoclassic economics; pluralism;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cs

(责任编辑 朱慧娟)